

影射史學批判



YING SHE
SHI XUE
PI PAN

新 天 方 地 利

THE BLUE
SKYLINE
DIARY

影射史学批判

开封师范学院历史系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影射史学批判

开封师范学院历史系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郑州二七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3\frac{1}{2}$ 印张 67千字

1978年9月第1版 197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统一书号3105·363 定价0.22元

序 言

为了肃清“四人帮”大搞影射史学的流毒和影响，开封师院历史系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二十四日举行了史学讨论会。会议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愤怒地批判了“四人帮”大搞“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的反革命罪行。大家指出：历史学是一门党性很强的社会科学。史学领域内的斗争是与社会政治斗争紧密相联的。“四人帮”及其喉舌梁效、罗思鼎之流，恣意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随心所欲地伪造历史，在“古为今用”的幌子下，搞什么评法批儒，批“宰相”，批“代理宰相”，批“现代大儒”，把攻击的矛头直指敬爱的周总理、英明领袖华主席和一大批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别言用心地吹“女皇”，捧“军师”，实则为了美化吹捧自己，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四人帮”大搞“影射史学”的核心是“儒法斗争贯穿古今”论，主要的手法是：人为地突出古代特别是秦汉时代的复辟和反复辟斗争，而且根据其反革命政治需要，千方百计使古代史现代化，比附影射，搞乱人心。大家遵照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原理，认真分析了我国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四人帮”搞历

史，根本不是什么研究学问，完全是在玩弄一种反革命政治手段。他们完全承袭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史学，否定历史有客观规律，否定历史的真实性。叛徒江青不是露骨地说：“我不是玩古的，是为了实用”吗？梁效不是公然说：

“只有写的历史，没有真正的历史”吗？“四人帮”代表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他们害怕真理，只有捏造历史，臆造历史“规律”，乞求于反动的唯心主义，为其反革命政治目的服务。批判影射史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深挖“四人帮”反动的思想根源。只有从世界观的高度来批，才能批深批透，从根本上划清“古为帮用”和“古为今用”的界线。

英明领袖华主席指示我们：“我国人民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头等大事，仍然是把揭批‘四人帮’这场伟大斗争进行到底。”当前，揭批“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正在全国深入展开。为了配合这场战役，我们收集了六篇揭批“四人帮”大搞影射史学的文章，供史学战线的同志参考。如有不妥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七八年三月

目 录

序言.....	(1)
唯心史观的拙劣表演.....	陈昌远 (1)
影射史学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恶工具.....	孟祥才 (22)
剖析反动的影射史学.....	瞿林东 (40)
大搞影射史学的反动目的在于篡党夺权.....	张嘉沧 (62)
划清古为今用与影射史学的原则界限.....	张海鹏 (82)
借研究巴黎公社之名 行篡党夺权之实	管敬绪 赵克毅 (98)

唯心史观的拙劣表演

陈 昌 远

长时期以来，“四人帮”控制的御用写作班子，即“北霸天”梁效、“南霸天”罗思鼎，自称“史学理论权威”，霸占史坛，南北呼应，大搞影射史学。他们根本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否认几千年的文明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用“儒法斗争”代替阶级斗争，反对和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抹杀人民群众的历史功绩，否定劳动人民和农民战争在历史上的作用；极力吹捧帝王将相；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前我国史学工作的成就，另搞一套，在我国史学领域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混乱局面。肃清“四人帮”在史学领域中的流毒，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历史颠倒过来，真正使历史科学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锐利武器，这是当前史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

（一）

自从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以后，才使历史真正成为科学。“马克思……指出以科学态度研究历史的途径，即把历史当做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的途

径。”（列宁：《卡尔·马克思》）这就是唯物史观。否认人类历史发展具有客观规律，把历史看成是一些天才圣人英雄人物手中的玩物，这就是唯心史观。历史研究有无规律可循？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是根本对立的。在近代中国，梁启超说：“历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①。胡适认为：客观真理则是一种“成见”，只不过是一堆偶然孤立的事件的积累，并无客观规律可循。他说历史“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的由我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实在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样”^②。因此，他们可以任意解释历史。在他们看来，只有人写的历史，没有客观存在的历史。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随意解释歪曲中国历史，否认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其目的在于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中国革命。胡适曾叫嚷：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认为中国早已有社会主义，大谈王莽、王安石的什么“社会主义国家试验”的“失败”，“认为他们的失败更使我们了解苏俄试验的价值”^③。陶希圣胡说什么中国“宗法封建社会的构造，其庞大的身分阶级不是封建领主，而是以政治力量执行土地所有权并保障其身分的信仰的士大夫阶级”，成为“中国资本主义……不能发展的桎梏”的，只是“士大夫阶级”。又说：“士大夫与地主并非一物，因为地主未有身分，而士大夫未必有土地”^④。这就从根本上取消了中国革命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托派在这个问题上，则是歪曲中国古代社会为“资本主义社会”。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无论是资产阶级实用主义者胡适，还是新生命

派的陶希圣和托派，他们共同的手法和目的，都在于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随意歪曲中国社会性质，为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中国革命提供历史理论根据的。

⑨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今天，“四人帮”为了欺骗群众，在口头上，也大讲“规律”，说什么要从历史“找寻关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规律性的东西来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⑤。但是他们所说的“规律”，并不是客观的，而是由他们主观臆造出来的。例如：他们为了打倒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把自己打扮成为“反复辟的英雄”，便独出心裁地“创造”出一个“老干部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由民主派必然走到走资派”的规律，还臆造出中国古代地主阶级继续革命反复辟的规律，说什么：在我国封建制代替奴隶制时代，“商鞅变法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经过了一百三十多年”，“从秦王朝建立，一直到西汉王朝灭亡，将近二百五十年中间，尽管奴隶主复辟势力逐步削弱，但是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始终没有间断”⑥。“秦始皇统一中国到刘邦建立西汉王朝这是我国封建社会战胜奴隶制复辟，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巩固封建的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法家和儒家在政治、军事、文化各条战线大决战的时刻”⑦。又说：“只有不断进行生产关系的变革，才能取得地主阶级政权的巩固”⑧。在这里“四人帮”把历史上封建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的复辟斗争延长到西汉时代，把秦统一作为我国封建制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时期，而把西汉作为封建制开始巩固时期，其间又充满着复辟反复辟的斗争，这就从根本上否

定了我国战国是封建制的确立和诸侯封建割据的存在，从而把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开始时间推移了二百多年。“四人帮”把历史上封建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的复辟斗争延长到西汉，并把汉代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说成是封建地主阶级与奴隶主复辟势力的矛盾，这就从根本上否认了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由此，他们炮制出了所谓封建地主阶级继续革命进行反复辟斗争的“规律”。按照他们“权力意志”设想出来的有“实用价值”的“模式”、“框框”，不择手段地篡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明确指出：“如果说，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末，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四人帮”公然篡改秦汉之际历史的阶级内容，是对毛主席关于中国古代历史所作的科学论断的无耻背叛，是资产阶级实用主义为“我”即“真理”、即“规律”的反动理论的拙劣表演。“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臆造出了一个所谓封建地主阶级继续革命反复辟的“规律”，并以他们臆造的这个“规律”的“模式”，任意去解释历史、歪曲历史，把中国历史糟踏得不成样子。

在我国历史上，由奴隶制转变到封建制，并不存在象“四人帮”所说的那样地主阶级需要继续革命，曾不断地进行过反复辟的斗争。在中国历史上由封建制代替奴隶制，封建制的因素早已在奴隶制内部孕育着。具体来说，从经济制度方面看，早在公元前七世纪中叶，齐国实行“相地而衰征”（衰

征，有等差的征）^⑨，以后晋国“作爰田”^⑩，鲁国“初税亩”^⑪，郑国“作丘赋”^⑫，楚国“量入修赋”^⑬，都在不同程度上破坏了井田制，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上层建筑也相应地发生变化。作为分封制对立物的县，在公元前689年首先在楚国出现^⑭。到公元前596年前后，楚已有九县，代国君统治县的叫“县公”，“县尹”。晋国在公元前536年，有四十九县。属于国君的县由“县大夫”去统治。齐国也有县，铜器《叔夷钟》铭文，记齐灵公以三百县的土地赏给叔夷。可见到春秋后期，晋、楚、齐等国作为崭新的政治制度的县为数已相当可观，打破了分封制的局面。从礼治方面看，这时已开始崩溃：最保守的鲁国已出现“季氏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彻”^⑮而“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⑯。作为“礼”的对立物“法”已出现并得到迅速发展。这些事实说明春秋时期随着奴隶制的衰落，封建制的因素早已产生，并且日益发展，但这时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在形成过程中，到战国时期才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并对奴隶主阶级进行了斗争。这些新兴地主阶级，好多都是从奴隶主贵族转化而来的，当时田氏代齐是新兴地主阶级向旧奴隶主贵族夺权斗争的典型国家。而田氏，本来就是春秋初年陈国发生内乱，奴隶主贵族公子完逃往齐国，齐恒公任命他为工正的官而发展起来的。晋国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韩、赵、魏三家，本来是在晋国灭公族的斗争中壮大起来的。由于这些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他们之间有共同点，都是剥削阶

级,要求建立严格的等级制度和强烈的宗法血缘关系。在对待被压迫人民上,都是实行强制占有的,他们只能改变剥削的形式,而不会改变他们剥削压迫人民的实质。因此,当他们在夺取政权时,需要人民的支持,这时新兴地主阶级就改变剥削的方式来拉拢人民,如田氏就实行大斗大秤借出,小斗小秤收入,因此民众拥护田氏,“归之如流水”^⑩,而成为田氏门下的“隐民”。可是在夺取政权以后,就很快撤消对奴隶主的防线,和奴隶主联合起来,把人民踩在脚下,给人民套上一副新的封建枷锁。以上事实说明历史上新兴地主阶级政治革命有很大的妥协因袭与不彻底性。对旧的奴隶制度,并没有采取摧毁性的打击,而往往把奴隶制残余当作剥削的补充形式。因此,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后,不需要有什么地主阶级的继续革命。《史记·商君列传》明确记载商君“变法之令”,“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司马贞《索隐》云:“末谓工商也”。“怠者,懈也,《周礼》谓之‘疲民’。以言懈怠不事事之人而贫者,则纠举而收录其妻子,没为官奴婢,盖其法特重于古也”。这就表明商鞅变法时所制定的法律,就把“事末利”及“怠而贫者”连同其妻子没为奴隶的规定,可见奴隶制的存在是合法的,奴隶制的残余,是受到地主阶级法律保护的。在云梦出土的《秦简》中《法律答问》有许多把犯罪的人笞没为奴隶的规定。例如“盗百二十钱”,“当耐为隶臣”^⑪。在秦律中可以看出秦保存了大量的奴隶制残余。这些奴隶制残余,有用于生产的,也有用于非生产性的。在汉代文献中也有这方面的记

载。当时用于田事的，如《史记·季布传》说：“季布许之。乃髡钳季布，衣赭衣，置广柳车中，并与其家僮数十人，之鲁朱家所卖之。朱家心知是季布，乃买而置之田”。朱家能买数十人置之田，这反映当时用奴隶从事生产的事实。《汉书·张安世传》记载：张安世“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内治产业”。《后汉书·樊宏传》记载：樊宏“父重字君云……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僮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利岁倍，至乃开广田土三百余顷”。王褒《僮约》说：“奴老力索，种莞织席，事讫休息，当春一石”。这些都说明在秦汉时期奴隶制残余大量存在，是有其深刻阶级根源的。所以恩格斯说，在中世纪初期，农奴制“包含古代奴隶制的许多成分”（《马尔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这些奴隶制残余虽然存在，但在当时并不是生产关系的主流，生产关系的主流仍然是封建的剥削形式。对奴隶的剥削，只不过是一种补充形式而已。

“四人帮”抓住秦汉时期一些奴隶制残余表面现象大做文章，歪曲秦汉时期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臆造出一个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继续革命反复辟的“规律”。他们并不是在总结历史上阶级斗争的规律性，而是在大搞影射史学，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以“四人帮”在批林批孔期间，大讲“评法批儒”，大肆吹捧“法家是反奴隶主复辟的英雄”，“先进阶级的代表”。他们这样吹捧的目的，就是要把自己装扮成为“法家”，“先进阶级的代表”，“反复辟的英雄”。而把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

家，说成是“儒家”，“旧的生产关系的代表”。所谓批“宰相”、批“代理宰相”，批“现代大儒”，把罪恶矛头，指向周总理和华国锋同志，妄图打倒他们来实现其篡党夺权、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这就是“四人帮”臆造“规律”的要害。

（二）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自原始社会崩溃以后，“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共产党宣言）》这是唯物史观的另一个基本观点。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马克思最先得出的、并把它引申到底了的这个阶级斗争学说的结论，“因为这是无产阶级手中最好的武器”（《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321页），所以，坚持还是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是区别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重要标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科学地回答了关于阶级的起源、发展和消亡的必然规律等一系列问题。而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他们在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总是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资产阶级实用主义者胡适就是如此。他针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起源学说，拚命否认中国原始社会的存在。否认中国原始社会的存在，就是为了否认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社会存在的可能，从而把私有制说成是从来就有的、永恒不变的东西。这个理论恰恰是为现代帝国主义垂死挣扎的资产阶级进行辩护的反动谬论。

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抹煞阶级的存在，

还把封建社会说成是一幅人类互相友爱没有阶级矛盾，没有阶级斗争的“行乐图”。“四人帮”也步其后尘，在歪曲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时，也把秦代社会描写成一幅封建社会的“行乐图”。说什么：“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继续实行法家路线”。“更名民曰黔首”，是“秦始皇对当时人民的一个尊称”，“实行使黔首自实田政策”和“上农除末，黔首是富”的政策，是“鼓励发展封建地主和自耕农经济，促进生产的发展”。又说秦始皇实行“缓刑罚，薄赋敛”是“发展封建农业经济保护农业劳动力的政策”。还说秦始皇时期赋税有限，徭役也不重，“一般是不随便‘发闾左’服役的”。同时政令很严，“不妄诛一吏”，“秦民大悦”，甚至说“秦始皇‘坑儒’是为了取得老百姓的谅解”^①等等，简直把秦王朝说成是人间的乐园，哪里还有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政治压迫呢？这完全是对历史的歪曲。他们把秦始皇描写成为“泛爱众”的观世音，可是：“始皇想皇帝传至万世，而偏偏二世而亡”^②，被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所推翻。这个历史事实就有力地批判了那种所谓封建社会是人类“互相友爱”，无阶级压迫剥削的反动谬论。整个人类阶级社会历史表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所以列宁说：“全部历史充满了被压迫阶级不断企图推翻压迫的事实。”（《列宁选集》第4卷第50页）这样的阶级斗争事实，贯穿着整个阶级社会的全部历史。“四人帮”妄图以“儒法斗争”代替阶级斗争，认为“儒法斗争”是解释中国历史的一条新线索。江青叫嚣“儒法斗争，从历史到现在都贯穿这

个斗争”^{②①}。还说：“中国长期伴随着儒法斗争，前期一定有儒，后期一定有儒，现在一定有儒，要不，为什么批林批孔”^{②②}？还说：“两千多年的儒法斗争，一直影响到现在，继续到现在，还会影响到今后”^{②③}。他们把历史上的儒法斗争变成一个超阶级、超时代、固定不变的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这完全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先验论，是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用篡改历史的卑劣手法凭空臆造出来的。

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的“儒法斗争”，它产生在春秋战国之际，是有特定的阶级含义和内容的。它分别代表了我国奴隶制社会转变到封建制社会这个转变时期两个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但这个斗争随着封建制的确立，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矛盾的产生与对立，这时儒法斗争就逐步消失合流。秦末农民大起义是一个关键。经过这次农民战争推翻了秦王朝的残暴统治，农民战争显示出推动历史发展真正动力的伟大作用，使地主阶级的地位开始向“纸老虎”转化。因此，西汉统治者在阶级斗争的新形势下，陆贾、贾谊、董仲舒等人，在总结秦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了荀子的“王霸兼用”的思想，为西汉封建统治者实行“以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思想提供了理论根据。陆贾认为“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②④}。贾谊就提出仁、义、法制兼用的办法。他在《过秦论》中就总结出秦的灭亡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②⑤}。为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藩国势力，提出“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②⑥}。在《治